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4.003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

王庆超, 崔雅婷

摘要: 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辩证关系范畴, 构成了解析新质生产力与人的解放命题的核心理论框架。从逻辑理路看,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建构的“劳动异化—技术革命—社会形态演进”分析范式, 为理解生产力变革与人的发展关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工具;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解放发展历史演进是理解其理论的重要线索; 从内涵机理看, 要素重塑、人本效能、创新赋能是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意涵的核心要义; 从实践路径看, 可通过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革新、劳动形态转型、上层建筑调适以及主体性升华等途径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实现人的解放注入强劲动能。

关键词: 唯物史观; 新质生产力; 人的解放意涵

中图分类号: F124;B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5)04-0019-12

收稿日期: 2025-05-15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安徽省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项目 (项目编号: 2024xscx095); 安徽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思想政治能力提升计划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项目“三位一体、三实融合实践教学方法” (项目编号: sztsjh-2023-2-9);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 sztsjh-2023-8-9)。

作者简介: 王庆超 (1988—), 男, 山东肥城人, 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 E-mail: 1322231737@qq.com; 崔雅婷 (1998—), 女, 安徽铜陵人, 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既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又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这一战略部署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党中央始终遵循“两点论”辩证法原理, 将生产力革命性突破与人的主体性释放纳入统一的战略视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论, 唯物史观架设起解析社会进步机理的三大坐标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其中, “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解放”命题具有三重理论意涵: 在认识论层面, 它深刻揭示了高质量发展与生产力形态跃迁的辩证规律; 在实践论层面, 这一理论模型为

制度创新提供了行动指南；在价值论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始终指向人类文明形态重构的终极目标。

一、理论视域：唯物史观框架下的分析范式重构

新质生产力的解放效应实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革命范畴，不仅改造着人类物质生产的技术形态（生产力革命），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嬗变引发生产关系的裂变式重构（社会革命）。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揭示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这意味着科技创新不仅仅是解决具体技术难题的手段，更应该被理解为孕育社会变革的基因编码。这一理论特质在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的著名论断中，得到了极具时代穿透力的印证。当代语境下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在于其引发的不仅是具体生产工具的迭代升级，更是形成了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资本积累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这使得科技创新与社会形态演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同构性特征。

（一）“手工化生产—机械化生产—智能化生产”的人类历史发展经历提供了理解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的基本逻辑

人类生产力发展史呈现出“手工化—机械化—智能化”的范式转型轨迹，这一演进过程本质上构建了解释技术革命与人类解放辩证关系的三维坐标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深入解析不同时期生产工具的物质属性与制度载体的相互作用，建立起生产范式跃迁的人类解放解释框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比性案例揭示技术迭代中的解放逻辑：“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4]这种技术代差不仅展现了物质财富的增殖速率，更深层次地折射出技术工具对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形塑力量。恩格斯在解放理论的双重维度构建中提出，社会生产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每个社会成员“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运用”^[5]，这为理解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向度奠定了辩证思维基础。列宁结合苏维埃建设实践，创新性地论证了电气化工业基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强调“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6]，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也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绝对必需的物质前提。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跃升，都为改变劳动方式、社会结构和人的发展条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必然要求并推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最终服务于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在资本逻辑裹挟下加剧劳动的异化和社会对抗；而真正的、彻底的人的解放，则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使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和自由发展。这种辩证认知对于解读新质生产力的解放本质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当前，以智能技术集群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引发生产力范式的结构性变革。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对“人的对象化”的单向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展现出双重突破：在实践层面解构了“技术决定论”的线性思维，在价值层面超越了“主客二元”的对立框架。传统生产力理论确实存在认知局限，如马克思批判的“一切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在政治上都是统治工人阶级的手段，在经济上都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7]289}。这种基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认知范式，已难以解释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生产模式中的主体间性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通过三个维度实现范式革新：其一，在存在论层面重构人一机一环境的关系认知，

将技术演进视为主体能力的外延式扩展；其二，在价值论层面强调发展尺度的多元性，统合效率追求与人文关怀；其三，在方法论层面建立动态调节机制，使生产力发展过程成为主体自觉性的实现路径。这种理论创新在智能化生产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解释效能。从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协作到智能工厂的人机共融，不仅是生产工具的物质性跃迁，更是人类主体认知层次的革命性提升。当劳动者从重复性体力劳动转向创造性智力劳动时，其本质力量的实现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这正是马克思所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当代诠释。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理解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意涵的基本要求

唯物史观通过建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内在此理。要系统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生产力范畴在人学维度上的价值意蕴，需要构建双重阐释路径：既要回归原典语境，全面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本质属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更应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深入探究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解放诉求之间的动态耦合机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是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8]。这些经典论述表明：一方面，马克思的生产力解放理论与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具有理论同源性，两者都将生产要素的高度发展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前提，着力通过劳动形态革新重构人与自然、社会的三位一体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力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具体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变革，推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优化整合，后者则侧重于实现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这种辩证认知对于解读新质生产力的解放本质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动态演进与新质生产力的范式革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在实践检验中持续发展，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演进的内在此理与时代特征：其一，技术革新与矛盾转化的复杂性。新质生产力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能力，潜在地为改变传统劳动过程中某些对抗性因素提供了技术基础，促进更灵活的协作形式产生。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自动消除生产关系中的根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可能被用于强化控制和剥削；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和伦理规范，才能引导新技术服务于劳动解放、分配公平与社会和谐，有效化解或管控新的矛盾风险。其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新质生产力在物质层面和能力拓展层面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潜在地支持着马克思所强调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中所需的自由时间增长和能力全面发展。但这同样依赖于社会关系的调整，确保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技能的提升和创造性的发挥，而非新的异化形式。其三，人机协同与劳动形态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形态发生显著转变：智能化工具减轻劳动者在固定生产线上的束缚；数字化协作平台重塑组织关系；人工智能赋能知识创造，推动劳动从体能消耗型向智能创造型演进。其对教育体系的革新也为人力资本的整体跃升和终身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变革最终能否导向更平等、民主、富有弹性的社会协作网络，依然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引导。

第二，生产力系统演进与人本型生产关系的生成逻辑。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质变必然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其一，人机协同的共生性。在工业4.0生产体系中，着力探索如何使劳动者的创造性思维与机器的精准执行形成

互补增强效应,避免机器完全替代人或者人沦为机器的附庸,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能力提升和劳动尊严。其二,价值分配的共享性。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结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优势,不断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力求更公平地体现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值贡献,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三,发展目标的整体性。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深度融入生产体系,利用生态足迹监控等技术,推动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正在重塑当代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传统层级制组织让位于平台化协作网络,标准化工作流程进化为弹性化任务集群,科层式管理转型为分布式决策机制。这一演进过程深刻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发生变革,从而生产方式也发生变革”^{[7]201}。在生产力系统的现代化进程中,劳动者素质呈现两重提升趋势:在显性层面表现为数字化技能的快速习得,在隐性层面则体现为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持续增强。与之配套的劳动工具系统也加速更新迭代:从单机设备的自动化到生产系统的智能化,从实体工具的操作到数字孪生体的交互。这种立体式变革推动生产关系不断向人本方向演进,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生动诠释。

二、历史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解放发展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确立了一个根本性认识范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这一根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社会变革进程中人的解放的全新阐释维度。从哲学内涵来看,“人的解放”不仅指代物质生产力的解放,更蕴含思想观念、社会关系和发展能力的整体性释放。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生动体现着这一认识逻辑。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关系的持续优化,在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劳动者从旧的生产桎梏中获得解放;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使人民群众在参与国家治理中实现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结构的现代化跃升。这三个维度的耦合式发展,形成了解放人、发展人、完善人的系统性实践框架。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生产萎缩、民生凋敝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系统阐述了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在政治领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9]这一政治架构通过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为人的解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0]的发展方针,运用“一化三改”联动机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国家能够通过资源的集中调配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文化教育领域,毛泽东在主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他创造性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11],这一战略性部署不仅为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更从教育启蒙的维度开启了人的现代性建构。在社会治理层面,毛泽东主张通过所有制变革消灭城乡差距,提出“共同富裕”目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实现“人人平等、共同

发展”，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前提。在社会结构层面，毛泽东通过领导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瓦解传统农村的宗族与地主权威，重构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一过程不仅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也重塑了社会权力关系，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夯实了社会根基。这些多维度的耦合发展，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基础，更为后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前提和实践启示。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邓小平同志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学说。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系中，“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2]这一价值导向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维度，更将发展成果的共享提升到根本价值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理论框架始终保持着“两个文明”协同共进的辩证视野：在强调“物质文明是基础”的同时，明确指出“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这一重要论述实际上构建了人的发展所需的双重支点——生产力的持续解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而精神文明的推进则为人的现代性生成创造文化条件。这种理论创新将人的发展置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地位，既遵循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突破了单一经济维度的发展观局限。江泽民同志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首次以纲领性文件形式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性任务，并创造性地提出“两个互为”理论架构。他在系统论述中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13]该理论创新不仅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决定论的单一维度，更通过“科技双维驱动论”——即既要培育物质文明的科技沃土，更要培植精神文明的科技基因——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注入了新时代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转换。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要义体现为“三位一体”价值取向：一是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点，将“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14]确立为改革发展的根本坐标；二是建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法论体系，通过“五个统筹”制度设计推动发展质量跃升；三是完善“民生保障制度矩阵”，使改革发展成果呈现系统性、可及性的普惠特征。这种由发展理念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创新，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为后续理论突破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人的解放置于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体系在人的解放问题上展现出三大理论创新维度：其一，在矛盾转化维度彰显辩证思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这一转变既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客观进步，又凸显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的提升。需要特别指出，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性特征——既包含物质文化层次的丰富性，也涉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等多维诉求——为新时代人的解放提供了具体实践指向。其二，在体制机制改革维度彰显系统思维。习近平深刻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

全局性问题。新时代通过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与新时代发展需求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改革导向不仅聚焦于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更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人的解放建设的双重逻辑:既要以系统性改革破除制度性障碍,又要通过治理现代化提升社会整体效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制度性保障。其三,在人权保障维度凸显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构建起覆盖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的人权保障体系。同时,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倡导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人权治理观。这一维度不仅为人的解放提供了价值支撑,还从全球视野拓展了人的解放的实践路径。这三个理论创新维度有机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既深化了对人、自然、社会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又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把握能力,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解放置于辩证统一的框架下,贯穿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调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推动生产力解放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提升与全面发展,逐步突破传统生产力决定论的单一维度,将人的解放从物质层面延展至精神、制度与价值层面。进入新时代,伴随“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深化,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聚焦于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将人的解放与发展作为衡量生产力进步的核心标识。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不仅深化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注入了突破性创新动力,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系统性指引。

三、学理阐释: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意涵的多维呈现

新质生产力是因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产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15],其内在蕴含的要素重塑、人本效能、创新赋能等核心要义,为打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根本性动力。

(一) 要素重塑:新质生产力推进人的解放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7]654}。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劳动形态革命性变革的产物,其引发的生产要素的人本化转型成为推动人的解放的重要引擎。这种转型贯穿于新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推动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价值重构,构建起一个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发展体系,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第一,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形成的新型劳动者是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核心要素,不仅主导着生产力变革方向,更持续突破传统劳动形态的桎梏。与传统生产力中受限于固定岗位的劳动者不同,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新型劳动者具有数字化生存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他们不仅掌握智能工具操作技能,能够适应人机协同的工作场景,更具备自主创新意识和终身学习能力,从“机器的附庸”转变为生产的主导者,且主体性和创新能力得到极大释放,劳动越来越复归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6]。

第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形成的新型劳动资料是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作为生产力跃升的载体,劳

动材料的智能化演进正在重构人类劳动的基本范式。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劳动资料呈现出人机交互、虚实融合的显著特征,智能机器人、数字孪生系统等新型工具不仅延伸了人的物理能力,更通过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技术拓展了人类的认识边界。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使劳动者得以将程序化工作交给智能系统,专注于需要情感共鸣和价值判断的高级劳动,这种工具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异化劳动的存在基础。

第三,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新场域。传统劳动对象受制于物理空间的物质实体,而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技术构建了虚实共生的劳动新领域。元宇宙空间、数字资产、智能算法等新型劳动对象,打破了时空对劳动活动的限制,使人类创造力可以在数字世界获得无限延伸。这种劳动对象的革命性拓展,不仅释放了人的创新潜能,更通过数字化劳动成果的可复制性,实现了劳动价值的指数级增长,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

(二) 人本效能:新质生产力推进人的解放的实践特征

新质生产力作为人本导向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效能”特质集中体现在对传统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重构上。通过重塑劳动关系形态、创新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价值分配机制,构建起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实践范式。这种实践特征不仅突破了工业化时代劳动异化的桎梏,更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为人的解放开辟现实路径。

第一,在劳动关系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互相平等的新型劳动关系。传统劳动关系建立在资本主导的雇佣制度基础上,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明显。新质生产力则以数字平台、智能合约、DAO组织等技术-制度复合创新重构劳资权力结构。在此背景下,区块链技术支持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促使劳动者通过持有治理代币获得平等决策权;智能用工平台运用算法匹配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将传统“企业-员工”的刚性雇佣关系转变为“平台-创客”的柔性协作关系。这种变革将劳动者从被动执行者转化为自主决策者,劳动关系呈现出主体对等、权责共担的新特征,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第二,在社会分工层面,新质生产力催生人机协同的弹性分工体系。工业时代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将人束缚在固定岗位,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则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云脑系统等技术,推动形成“人类设计-机器执行”的新型分工模式。例如,在智能制造领域,工人角色从操作者转型为系统管理者;在知识生产领域,学者借助AI工具突破个体认知局限,实现跨学科知识创新。这种弹性分工体系打破传统职业壁垒,使劳动者能够根据兴趣和能力动态选择参与领域,推动社会分工从“岗位固化”向“能力流动”转变,为人的解放创造社会条件。

第三,在价值分配层面,新质生产力构建以贡献为导向的精准分配机制。传统分配制度难以准确衡量知识型劳动的价值创造,存在“劳动成果与劳动回报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则可以依托大数据追踪、智能合约执行、数字指纹识别等技术手段,建立起全过程可溯源的贡献计量系统。例如,在开源社区,开发者代码贡献通过链上记录自动获得代币激励;在创意平台,用户的创作内容根据流量、衍生价值等方面进行实时分成。这种基于技术赋能的分配革命,使“按劳分配”原则突破实物经济限制,拓展至数字劳动、创意劳动等新型领域,以确保人的解放具备可持续的物质基础。

(三) 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推进人的解放的核心驱动

创新是突破发展桎梏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引发的创新浪潮不仅推动了技术革新,更促进了生产

关系和人本价值的深刻变革，为人的解放提供持续动能。这种创新赋能体现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协同演进中，共同构建起人的全面发展的支撑体系。

第一，新质生产力推动的技术创新为人的解放提供工具支撑。在技术创新领域，作为以数字技术革命催生的跃迁式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既推动传统技术范式的迭代升级，更催生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诞生。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不断涌现，为人的认知能力、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不仅能够显著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升人的发展潜力，还能通过技术引领社会变革，催生出一系列促进人的解放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推动人的解放进一步深入发展。

第二，新质生产力催生的制度创新为人的解放构建保障体系。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在生产技术和文化形态上带来了深刻变革，更在制度层面激发创新活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制度创新，推动人的发展政策的完善与强化。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教育改革、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更新，不仅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为人的解放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社会机制的创新，构建人的解放的长效机制。社会机制在人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机制在实现人的解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即通过完善相应的社会形成机制，引导资源向人的发展领域流动，进而推动社会向人的解放方向转型。

第三，新质生产力引领的文化创新为人的解放培育价值土壤。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当前，数字原住文化、开源共享理念、人机协同伦理等新型文化形态，正在重塑社会价值认知。这种文化转型不仅能够有效地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精神需求的深度满足，还通过文化的发展方式的创新，实现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时代人的解放建设的重要载体。

四、实践路径：人的解放的路径选择与战略规划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的解放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关系变革的辩证统一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性突破，既构成了人类摆脱自然必然性束缚的物质前提，也为突破社会关系变异提供了现实可能。系统构建推动人的解放的实践路径需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根本遵循，从生产力革命性重构到主体性深层解放的递进维度出发，以此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的综合效能，把握人的解放的应然目标。

（一）生产力变革：物质基础的革命性重构

唯物史观揭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物质基础革命性重构的最新形态，新质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跃迁，更是通向人的解放的关键路径。其一，实现技术突破与工具革新。技术突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以促进人的解放。一是拓宽机器人研发的覆盖面。通过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农业智能工具等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实现人的体力劳动解放。二是深入人工智能领域研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标准化脑力工作，减轻人类的思维负担。同时拓展人类认知边界，激发创新与实践能力。其二，转型绿色生产力。通过转型绿色生产力实现人的解放，本质上是将人类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自然、劳动和精神的异化中解放出来，重塑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可从以下方面研讨：一是以绿色科技创新推动

先进生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将人束缚在低效且不可持续的生产关系中,而实现人的解放,绿色生产力应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应用,拓宽劳动对象的范围,使人类能够“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实现高效物质变换。这种变革不仅减少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还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将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具创造性的活动。二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生产力强调实现人与生态的双重解放,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征服自然”的异化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优先为发展路径,将人从与自然对立的矛盾中解放,恢复“生命共同体”的辩证关系。总之,唯有在物质基础的革命性变革中,人的解放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二) 生产关系革新: 社会关系的系统性再造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对人的解放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7]84}这一论断充分揭示了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需要充分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以实现人的解放。其一,创新实践所有制形式。一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劳动者持股”复合结构基础上,建立动态股权调整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时记录人才的知识产权贡献值,使“劳者有其股”从静态分配转向动态确权。其二,探索知识生产共同体制。在基础研究领域构建“国家实验室+高校+企业”联合体,实行“专利共有+署名专用”的二元产权制度,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银行实施技术专利证券化,形成知识资本公积金循环机制,破解职务发明制度对创新动能的抑制。其二,建立弹性劳动关系。一是深化劳动制度改革,构建灵活高效的劳动关系机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具有高度弹性和适应性。需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破除传统劳动关系的刚性约束,建立灵活的市场化用人机制;同时,完善非标准就业形态的权益保障制度,避免资本逻辑对劳动者的异化,确保劳动者在弹性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二是建立弹性劳动组织。基于区块链构建技能共享平台,劳动者以非同质化形式确立自身技能库,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弹性项目合作,最后按照贡献分配收益。其三,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一是突破数据要素垄断。面对平台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用算法霸权、算法黑箱或歧视性算法压低劳动者的薪酬待遇,进行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应构建“三级确权体系”即原始数据归采集者、加工数据归处理者、应用数据归使用者,最终实现“权属可追溯、收益可分割”;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所,推行“数据贡献度积分”制度,使劳动者凭借数据生产行为获取数字资产收益。这种“数据民主化”实践将使劳动者摆脱传统生产关系中“数据无产阶级”的困境。二是实施要素贡献量化考核。构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数据”四维价值核算体系,并通过实施“要素分红调节税”调节收入差距。总之,生产关系系统性再造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解放的枢纽环节,创新所有制释放知识资本的共创潜能,弹性劳动关系平衡效率与尊严,要素优化配置弥合数字鸿沟,三者共同构筑了“人主导技术”的社会基础。

(三) 劳动形态转型: 生产方式的范式跃迁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通过劳动形态转型实现人的解放,本质上是将从异化劳动、资本宰制及单向度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基于马克思“劳动创造人本身”的核心命题,结合数字化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构建实践路径:其一,劳动内容的智能化。一是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使劳动者能够熟练运用智能工具和数字技术,提

升劳动效率与质量。这一过程将减少机械性劳动,释放更多创造性空间,有助于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二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劳动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降低劳动强度并增强工作的趣味性和挑战性,有效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活力。其二,劳动组织的柔性化。一是优化组织结构。打破层级式组织结构,建立更加扁平化、灵活化的组织架构,缩短信息传递链条并提升决策效率,使组织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员工需求,增强环境适应性。二是推行灵活用工模式。采用弹性工作时间、远程办公、项目制用工等灵活用工方式,满足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和地点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动态平衡。其三,劳动价值的多元化。一是完善劳动价值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劳动价值评价标准,不仅关注劳动的经济价值,还要重视劳动的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鼓励劳动者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注重精神财富积累与生态效益提升。二是建立健全劳动成果共享机制。通过共享机制实现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生活品质,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激发劳动积极性与创新动力。总之,劳动形态的转型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支撑。智能化劳动释放了创造性潜能,柔性化组织重构了平等协作关系,多元价值体系将劳动复归为自我实现的媒介。这一转型不仅解放了劳动生产力,更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 上层建筑调适: 制度文明的迭代升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这一论述充分揭示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完善社会制度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推进人的解放。第一,教育体系改革。一是构建产教融合的智能教育生态系统。通过推广“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以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数字化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劳动者。二是建设终身学习的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建立“学分银行”打通职业教育、企业培训与高等教育壁垒,实现个人学习成果的终身累积与跨域流通。三是推进教育公平。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调配将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借以算法补偿机制消除城乡、阶层间的数字鸿沟。第二,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更多的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技术性失业群体等,以此破除非标准劳动关系下的保障缺失;同时建立数字时代的新型福利制度,颁布实施“数字素养提升补贴”,为劳动者素养提升提供支持。二是引导资本有序发展。既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管等措施,防止资本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进而操作市场价格,损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又增强市场准入制度,将资本限制在新型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的合理范围内,不断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17]。三是实施数据保护法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价值主体必须依法采集、存储、分析和使用数据,不得歧视性地、有差别地采集数据,不得侵犯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和知情同意权,不得恶意垄断、误用、滥用数据,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18]。第三,重塑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一是构建数字主权共享框架。联合国应推动国际数据治理协议签订,平衡国家数据主权与全球技术协作需求,防止技术霸权挤压个体发展空间。二是制定全球技术伦理标准。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国际社会应共同制定全球技术伦理标准,规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确保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伦理规则。总之,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可以逐步完善制度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解放。

(五) 主体性升华：重塑主体发展模式

生产力演进始终与现实世界中的生产主体相互依存，人类以生产力为基石实现自我发展，而生产力的动态演进持续塑造着生产实践中的个体。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形态的革新跃迁，正推动生产力体系发生结构性变革，身处这一变革浪潮中的社会成员必然受到新质生产力的深度重构，在技术赋能中实现主体性的多维跃升。首先，认知能力的技术增强。一是实现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融合。通过研发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增强人类信息处理速度与记忆容量；利用神经反馈训练优化认知模式，突破传统学习效率瓶颈。二是开发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构建个性化认知增强工具，将大数据分析能力嵌入个体决策流程，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认知偏差。其次，能力结构的智能化升级。一是正确价值观念指引。通过思想教育提升劳动主体的精神境界，劳动主体主动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从而消除数字鸿沟^[9]。二是构建人机协同培养体系。在职业教育中增设“人机协作”“算法逻辑”等课程，培养劳动者在智能制造、数字孪生等场景中的主导能力，避免沦为技术附庸。三是实行动态技能认证。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能力资产链”，将个体技能转化为可追溯、可交易的数字凭证，从而打破学历本位评价体系。同时，引入“贡献度算法”，量化创意、协作等非标准化能力价值，建立多元能力评估模型。第三，社会参与的深度化。一是建立数字民主化平台。建立“区块链政务平台”，公民可通过智能合约参与政策制定；同时推行“算法透明化法案”，强制公开公共服务平台的决策逻辑，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二是构建全球治理数字参与。推动建立“全球数字公民联盟”，通过去中心化组织形式参与气候治理、数字贸易等议题。总之，通过重塑主体发展模式提升人的认知能力、能力结构以及促进社会参与的深度化，将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人的解放。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9.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 [6]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9.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4.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5.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5.
-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 [13]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5.
- [14]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40.
- [15] 新华社.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N].人民日报,2024-03-01(9).
- [16] 柯萌.新质生产力赋能劳动解放:理论基点与实践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59-64.
- [17] 燕连福,牛刚刚.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2):82-90.
- [18] 孙伟平.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J].哲学研究,2023(3):46-55+126-127.
- [19] 焦成焕,魏艳平.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劳动幸福的实现[J].宁夏社会科学,2024(3):112-122.

Exploring the Emancipatory Implications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for Huma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NG Qingchao, CUI Yating

Abstrac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categorie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titute the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posit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 From a logical perspective,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of "labor alienation---technological revolution---evolution of social formations" established by Marx and Engel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systematic theoretical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rves as a critical clue for comprehending this theory. In terms of intrinsic mechanisms, factor restructuring, human-centered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empowerment represent the core essence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emancipatory implications for humanity. Regarding practical pathways, developing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productive forces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novation, labor patterns transition, superstructure adapt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subjectivity can inject powerful momentum for realizing human emancip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emancipatory implications for humanity